

鲁迅与海涅

张 玉 书

海涅生前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亲眼看见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他逝世前两年写的**重要著作《自白》^①**中,他写道:他羡慕他的伟大的同行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因为歌德在他的诗歌中告诉我们,他已经知道他的“绿蒂”和“维特”业已传到中国,而海涅则只能满足于以下的事实,那就是在海涅生前他的作品已经有了日文译本。海涅发出这番叹息之后六十年,他的作品才被译成中文。第一个翻译他的作品中国人就是鲁迅。

191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用文言文写下了他关于外国文学的第一篇重要的**1 论文《摩罗诗力说》**,刊载于1908年《河南》月刊第二、三号,署名令飞,收入《坟》。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向我们介绍了以拜伦为首的摩罗诗派,也就是魔鬼诗派的诗人及其作品。“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囊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②。这些以拜伦为代表的诗人其共同的特性是什么呢?“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③也就是说,这些诗人的作品里,以反抗、挑战之声为主调,抨击时弊,桀骜不驯,不作顺民,宁为叛逆。像果戈里那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④。总之“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介绍其伟美于世界”^⑤。

那么在鲁迅笔下,拜伦如何呢?他谈到拜伦之前有司各特^⑥辈,“为文率平妥翔实,与旧之宗教道德极相容”^⑦。可是等到拜伦出现,“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⑧。这就是新声。鲁迅于是问道:“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旦”^⑨。这个雅号得之于骚色^⑩,此人能迎合时人的口味,于是获月桂冠,他攻击拜伦,不遗余力,拜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⑪。

鲁迅借拜伦笔下的海盗康拉德^⑫的形象为拜伦本人描绘了一幅肖像:“于世已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惟以强大之意志,为贼渠魁,领其从者,建大邦于海上。孤舟利剑,所向悉如其意……往虽有神,而康拉德早弃之,神亦已弃康拉德矣。故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⑬

然而康拉德之所以变成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实乃环境所迫。“然康拉德为人,初非元恶,内秉高尚纯洁之想,尝欲尽其心力,以致益于人间,比见细人蔽明,谗谄害聪,凡人营营,多猜忌中伤之性,则渐冷淡,则渐坚凝,则渐嫌厌,终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举而报之全群,利剑轻舟,无间人神,所向无不抗战。盖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矣。”^⑭鲁迅指出:拜伦笔下的英雄,实际上就是拜伦本人。“篇中康拉德为人,实即此诗人变相,殆无可疑已。”^⑮拜伦的曼弗列特^⑯,意志坚强,这点也象拜伦。鲁迅说:“曼弗列特意志之强如是,裴伦亦如是。”^⑰那么拜伦的“凯因”^⑱实际上也是拜伦本人。他公然对宗教的教理提出挑战,并且拜撒旦为师。而《天地》篇^⑲,更为魔鬼鸣不平:魔鬼本是上帝所造,因为

产生非分之想，而被逐出乐园。“败而堕狱，是云魔鬼”²⁸。然而“伊甸，神所保也，而魔毁之，神安得云全能？况自创恶物，又从而惩之，且更瓜蔓以惩人，其慈又安在？故凯因曰：神为不幸之因。神亦自不幸，手造破灭之不幸者，何幸福之可言？”²⁹

这些话，自然是对神的大不敬，也是对宗教教理的反叛。卫道者们认为他离经叛道，败坏道德，摧毁社会的精神支柱，破坏国家的法度，难怪拜伦被看成是魔鬼派的诗人。其实拜伦当时的英伦，“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缚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辄谓之恶人。裴伦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以默矣，故托凯因而言曰，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遂不值与人群敌。世之贵道德者，又即以此交非之”³⁰。鲁迅的这番话，说明拜伦的这种反抗伪善社会，反抗宗教教义及其道德的诗篇，尽管被卫道者斥为魔鬼的作品，然而它们道出了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一代人的战斗精神，因而影响极深极广³¹。鲁迅盛赞拜伦的诗：“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象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³²而在德国，受拜伦影响极大的乃是海涅。可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对海涅却只字未提。

海涅青年时代极其崇拜拜伦，在海涅登上诗坛，写下他那传世名篇《诗歌集》的同时，他认真学习了拜伦的作品，并且翻译了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的第一幕第一场和诗剧《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三首诗，受拜伦诗剧的影响，海涅在这一时期写了两出诗体的悲剧《阿尔曼梭》和《拉特克利夫》。海涅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对东方异国情调的欣赏和向往，他那辛辣犀利的讽刺笔法都和拜伦的影响密不可分。当然最主要的是拜伦的叛逆精神和反抗精神，使得海涅把这个仅仅比他大九岁的英国诗人引为楷模，甚至衣着仪表也模仿拜伦，因此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海涅被人称作“德国的拜伦”。1824年4月19日，参加希腊独立战争的拜伦，死于米索朗基。噩耗传来，海涅十分悲痛，他在同年6月25日致朋友摩西·摩色尔的信里这样谈论拜伦：

“我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和我气质相近，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可以相提并论。”

从海涅一生的创作和战斗来看，他无疑是属于鲁迅所说的以拜伦为代表人物的魔鬼派诗人的。

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旨在打破中国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他“别求新声于异邦”³³，想用异国之新声来振兴民族精神。在几千年封建压迫下，人的性格被扭曲，在国民性里，孳生了不少奴性，像死水一样的宁静实际上反映的是举国上下噤若寒蝉，死气沉沉。这种奴隶的和平会使人意志消沉，锐气丧尽，会使我中华民族永远被人奴役而不自觉。他希望借魔鬼诗人的异国新声，促使国民自强不息，这就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对尼采感兴趣，并且后来还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³⁴的序文的主要原因。

本文不想对尼采作全面的评价，只想说明鲁迅眼中的尼采究竟是个何许人物。鲁迅欣赏尼采的“欲自强”³⁵，欣赏尼采争当强者，欣赏尼采克服自身的弱点，超越自身的努力。尼采最恨随波逐流，随俗浮沉，最恨庸俗的芸芸众生，最恨市侩。这些市侩是德国社会的奇怪产物，他们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只求安逸，不求进取。基督教的道德把他们教育成平庸驯良的芸芸众生，软弱怯懦，因循保守，碌碌无为，媚上欺下，因为自己孱弱，便称自己为善，以弱自诩，而对强者则百般攻讦，斥之为恶。这样下去，自然不会有进步。因此尼采倒过来，讴歌这种“恶”，因为他自强不息，而这股自强不息的力则受到鲁迅的赞扬。尼采称

自己为反基督徒，要求把基督教宣扬的一切道德价值全都予以重新估价，因而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因而他也为社会所不容，被社会视为离经叛道，其学说自然被人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他的辛辣的讽刺，尖刻的讥诮，刻薄的嘲弄，显然和海涅一脉相承，难怪一向自视甚高的尼采，把自己和海涅相提并论，并且对海涅的天才推崇备至。

在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一书中，尼采这样评论海涅：“亨利希·海涅让我看到了抒情诗人的最高境界。我在几千年间各个地方寻找一种既甜美悦耳又激烈奔放的音乐，但是徒然。海涅拥有那种奇妙的刻薄劲，没有这种刻薄劲，我无法想像什么是完美的东西——……——瞧，他德语驾驭得多好，有朝一日人们会说，海涅和我遥遥领先，是掌握德语最为杰出的艺术家，远远超过一般德国人用德语写的东西，远到不可企及的程度。”在《尼采反对华格纳》一书中，尼采这样谈论海涅：“在巴黎，法国人称他为‘值得崇拜的海涅’，他的诗歌早已融化为法国更深刻更热情的抒情诗人的血肉。”在尼采的遗稿里，他这样评论海涅：“犹太人出了亨利希·海涅和奥芬巴赫，在艺术领域里达到了天才的地步。”

海涅应该属于摩罗诗派，而没有列入摩罗派诗人之中，是由于学术界对海涅的成见，一百多年来，海涅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为现存制度唱赞歌，他既不做统治阶级的帮凶，也不做帮闲，而是把他飞矢火箭一般的革命诗篇射向封建专制制度，射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曾经被他讽刺的箭矢锋刃打得遍体鳞伤的人，以及他们精神上的后代，一直对海涅耿耿于怀，他们恨不得全盘否定海涅。可是海涅的诗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无法否定。于是他们便退而求其次，只介绍作为抒情诗人的海涅，而作为革命诗人的海涅，他们是绝口不提。本世纪初在日本流行的德国作家主要是以霍普特曼为代表的德国自然主义作家和苏德曼等人。在坊间流行的海涅的作品主要也是海涅的抒情诗。因此鲁迅在撰写《摩罗诗力说》一文时，把海涅主要看成一个恋爱诗人，不是一个拜伦式的反抗和叛逆的魔鬼派诗人。鲁迅在1933年给《海涅与革命》一文写的译者注释中，明确写道：“以前我们认为海涅是恋爱诗人，现在知道他还有革命的一面。”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学成回国，经历了辛亥革命。1914年2月1日，他在《中华小说界》第二期上发表了两首海涅的抒情诗，这两首分别是海涅的《诗歌集》中收集在《抒情的插曲》篇里的《短歌六十五首》中的第二首和第三十首：

余泪泛澜兮繁花，	眸子青地丁，
余声排壑兮莺歌，小女子兮，	辅颊红蔷薇，
使君心其爱余，	百合皎洁兮君柔夷，
余将捧繁花而献之，	吁嗟芳馨兮故如昨，
流莺鸣其嚶嚶兮，	奈君心兮早摇落。
傍吾欢之果腹。	

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三年，翻译了海涅的这两首抒情诗，显然也是本着“别求新声于异域”的精神，向国人介绍情诗中的这些珍品。海涅的抒情歌清新飘逸，纯净质朴，象民歌一样流畅自然，朗朗上口，可是内容新颖别致，感情深切动人。德国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赫伯尔^②曾经说过：“他（海涅）的诗歌从他心灵深处迸涌而出”。鲁迅翻译的第一首诗就正好为赫伯尔的这句话作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注解。“从我的泪珠里长出娇花朵朵，我的叹息变成一首夜莺的歌。”“海涅的抒情诗就是从诗人的泪水和鲜血里萌生出来的绚丽夺目的娇花，是诗人的叹息化成的一曲优美动听、凄婉动人的夜莺之歌，他的《诗歌集》不啻一座鲜花烂漫、夜莺啼鸣的花园，让人在那里看到以往从未见到过的内心的波动，历尽了恋人心情的幽微曲

折，读起来感情起伏，心潮激荡，又爱又恨，又怕，又伤心，又幸福又失望，期待时心灵在颤抖，受辱时灵魂在流血，欢会时的消魂陶醉，失意时的孤寂凄清。但是海涅的情诗哀而不伤，艳而不俗，主要在于他把感情写得真实细腻，尤其是自嘲的巧妙运用，使人感到他并未沉溺于哀伤，能够自拔。他在失恋时痛哭流涕，可是并没有泪眼模糊。在意中人的欺骗和不忠的后面，他已经看见了社会的不平，门第的偏见，财产的考虑。他使读者看到在这铜臭弥漫的社会里，爱情带有商品的性质，恋爱具有买卖的味道。”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即便是在夜莺的歌声里，娇花的香雾中亦含有社会批判的锋芒。

作为诗之国的中国有千百年悠久的抒情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人的感情受到压抑，儒家和佛教的双重影响，把一切感官的快乐全都视为罪孽，于是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善风气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公然宿妓纳妾不以为怪，而男女的正当爱情反而视为淫邪，因此情诗在中国一向不能得到发展，人的这一部分感情世界被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敢于问津。在辛亥革命后三年，鲁迅就把海涅的情诗译成中文，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极为革命的行动，其动机和出发点跟十年后郭沫若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致的。海涅一生和基督教作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基督教教义的伪善：

“我谈的那种宗教其最初的教条就判定肉身有罪，这种宗教不仅承认精神高于肉身，还想消灭肉身以炫耀精神，我谈的那种宗教，由于它那违反自然的任务才使罪孽和伪善来到人世，正因为它判定肉身有罪，连最纯洁无邪的感官的快乐也变成了罪孽，正因为人不可能完全靠精神生活，于是伪善便应运而生”^②。

海涅的抒情诗把爱情写得那样美丽，那样动人，使人感到爱情是崇高的、美好的，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不必为它感到羞耻，它不是罪孽。爱情是人的崇高的权利，是生活的花朵。这种认识，这种态度在今天已经为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而在当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是诗坛上的新声，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三年的中国，更是使人瞠目结舌的大胆行动。直接歌颂爱情，直接歌颂心爱的人，这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的文字，长期受到压抑的人，即使感情尚未完全窒息，也大多借用隐喻，曲折含蓄地表露思念渴慕之情，哪里敢这样直截了当、不加遮掩的披露自己的情怀。1914年的中国，封建势力远比1824年的德国更为强大。鲁迅翻译这两首诗的用意，显然并不仅仅在于诗句的优美，还在于这些诗篇的内容。日本海涅专家岸阳子女士曾经委婉地问道：“可不可以说鲁迅译海涅诗的意图和七年前介绍恶魔派诗人时的想法相同呢？”^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今天细细考察一下海涅和鲁迅的生平和著作，尽管他们一个生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德国，一个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时间相隔一个世纪，距离相隔一万多公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战斗历程，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好恶，有同样的爱，有同样的恨，他们恨凶残暴戾的封建统治阶级，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恨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和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他们热爱人民，热爱受尽苦难、备受压迫的人民，愿意为人民的解放而战。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发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④如果当时他没有找到这样的战士，那么后来他用自己一生的战斗证明自己已经变成了他寻求的那个战士。海涅也是如此，早在一八二八年他就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游记》一文中，称自己为“人类解放战争中的一名勇敢的战士”。他认识到他那时代的伟大任

务就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犹太人、西印度黑人和其他受压迫的解放，而且是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解放，欧洲已经成年，现在正挣脱特权者，即贵族阶级的锁链，尽管还有几个借助哲学出卖自由的叛徒，炮制最精巧的连锁推理，以便向我们证明：千百万人是作为几千特权骑士的牲口而被制造出来的。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的，只要证明不了前者是背着马鞍，而后者是脚上带着马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们就无法使我们信服。”

海涅的这番话，说明了他牢牢地站在被压迫人民的一边，他决心为了人民的解放和那些奴役人民、欺压人民的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决心，也出现在他的《北海集》第三篇里：

“我的祖先并不属于狩猎者之列，而属于被猎者之类，叫我现在开枪射击我祖先当年伙伴们的后裔，那我周身血液都奋起反抗，凭我经验得知，围猎之时，叫我射杀猎人倒比猎取动物更为容易。”读一读海涅的《游记》、他的《时代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热情洋溢地歌颂人民，就可以想像他的飞矢和火箭，以及其他的武器，曾给敌人以怎样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他们对人民充满了爱，因此他们对于被扭曲了的国民性，就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鲁迅对于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人的感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个“悲哀”和“愤怒”当中蕴藏着多少爱和同情。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奴役、压迫下，那些不觉悟的中国人的心灵被扭曲了，变得逆来顺受，安于现状，奴性十足，欺软怕硬，浑浑噩噩，被人欺侮而不自觉。这一切集中体现在阿Q精神上。尽管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被压迫者，值得同情，然而他的精神是丑恶的，它象毒菌一样在各处漫延，侵蚀中华民族健康的肌体，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是一种无形的剧毒，是一种变形、变质的民族精神。鲁迅塑造这个典型是为了唤醒民众，是为了让人看到那些凶残的统治者把人民扭曲到什么地步，从而对这些人民的敌人产生强烈的仇恨，然后挺起腰来，直起身来，恢复固有的伟岸英俊。这不是丑化，而是鞭策，不是认命，而是激励。

于是我们想到海涅笔下那些不觉悟的德国人民的形象。这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德国米歇尔的形象。他头上戴着一顶睡帽，成天睡眼惺忪，脸上一付痴呆懵懂、浑然不觉的神情，是个整天昏昏欲睡、耽于梦想的傻小伙子，总是受骗上当，总是浑浑噩噩。长期的封建统治，长期的宗教毒害，养成了他身上的奴性、惰性。在这点上，阿Q和米歇尔是何等相似。他们的胜利仅在精神上，仅在梦幻中，他们沾沾自得于辉煌的往日和美好的未来，对眼前的斗争并不热衷。对这样的人，海涅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于是他用辛辣的讽刺去刺他，让他猛醒。德国中世纪的昏梦长达一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迷梦比之长一倍，达两千多年。沉重的历史积淀压在他们身上，必须向它发起猛攻，把人民从这些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矫枉必须过正，所以鲁迅提出：不读一本中国书。海涅提出向法国学习，向法国大革命学习，并且树立拿破仑的形象。鲁迅推崇尼采、拜伦，推崇一切反叛者。他们把自己比作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把法国革命的思想、把俄国革命的思想、把先进的思想介绍给国民，把它们作为精神武器，也作为药饵来医治国民的痼疾。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可以更加深切地理解鲁迅和海涅的文艺观和他们的文艺活动。

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为尖锐，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人民大众在死亡线上挣扎，饿殍遍地，战祸频仍，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帝国主义的凶焰日益嚣张

张，在这样的时刻，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吟咏风月，也不该去伤春悲秋，因此鲁迅在这时的文艺观点便颇为激进，对文坛上一些作家的批评便显得严峻。今天我们客观地评论，应该承认，无论是新月派诗人还是其他作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有独到之处，他们丰富了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取得了成绩，应该在文学史上给予应得的席位。鲁迅当年对他们的批评，似乎有失偏颇。但是如果想到当时中国的形势，想到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巨大灾祸，想到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想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我们对鲁迅的偏激也就会多一些理解。在这种时候，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文学的战斗使命、文学的政治内容。

回过头来，我们对于海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德国浪漫派的批评也就多一些理解了。德国浪漫派无疑对德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德国浪漫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可是海涅却对它狠加挞伐，他把德国浪漫派比作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发出来的苦难之花，带有浓厚的天主教的色彩，宣扬的是天主教的精神：“狗一样的谦卑，天使一样的忍耐”^①是和宗教同样的麻醉剂。它是叫人消沉忍让，而不是叫人积极进取，是叫人神游梦境，而不是叫人立足现实。这种文学并不是不美，只是和现实很不协调。海涅说：他曾经迷恋浪漫派诗人乌兰的诗，在杜塞尔多夫故宫的废墟里，有无头女人在深夜出没。诗的意境不能说不美，诗意不能说不浓。可是一想到火热的现实斗争，沸腾的现实生活，阳光灿烂，鼓声隆隆。此时此刻，那吟咏无头女人午夜漫游的诗句音节再铿锵，画面再优美，也会使人感到别扭。因此在这种时候，海涅便向作家提出忠告，要立足于现实，要反映现实生活，要向巨人安泰一样，紧紧地挨着母亲大地，不可神游于蓝色的太空之中。“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库勒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②

由此可见，无论是海涅还是鲁迅，他们都认为文艺创作应该和现实斗争密切配合，他们都把文艺当作是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武器。

也是基于对人民的热爱，基于他们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他们热心地向自己的人民介绍外国的文学艺术、外国的先进思想，他们象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一样，把他们认为是先进的思想、精良的武器偷运给他们的同胞。从《摩罗诗力说》一文开始，鲁迅把介绍外国文学几乎放到和自己的创作同样重要的地位。他起先介绍摩罗诗派的诗人，介绍尼采的哲学，介绍凯特·珂尔维支的版画，继而介绍苏联文学。不仅鼓励青年人翻译，自己也亲自动手翻译。1931年2月21日，德国《红旗》报上发表了O·毗哈为纪念海涅逝世七十五周年写的一篇题为：《亨利希·海涅和共产主义》的文章。鲁迅在1932年8月从日文转译了这篇文章，并把它以《海涅和革命》为题予以发表。这一事实说明，鲁迅已经认识到海涅不仅是一个恋爱诗人，还是一个革命诗人。他是把这篇介绍海涅生平的文章当作革命的火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海涅生前也是竭力向德国人民介绍外国革命的文艺、革命的思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在他青年时代，他曾经翻译过拜伦的作品。在他几篇著名的《游记》里，介绍法国大革命，宣扬拿破仑的功绩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内容。法国之于海涅，犹如苏联之于鲁迅。海涅希望法国大革命能够在德国重演。海涅并不是不知道拿破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两重性。他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游记》中写道：“亲爱的读者，我恳求你别把我当成不折不扣的拿破仑主义者。我敬重的不是人的作为，而只是人的天才，不论他是亚历山大·凯撒，或是拿破仑，我只是在雾月十八——当时他出卖了革命——以前无条件地热爱他。”

他之所以在以后的作品里还一再歌颂拿破仑，是因为他把拿破仑理想化，把拿破仑当作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他衷心希望由拿破仑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能在他的祖国德意志的土地上实现。在《法兰西现状》一书里，他把拿破仑称作代表人民的人：

“后来欧洲所有的国王纠集起来反对拿破仑，这个代表人民的人，在这次君王叛乱中失利败北，普鲁士蠢驴给那垂死的雄狮最后踢上几脚，这时拿破仑对自己的疏忽之罪后悔不迭。”

法兰西对海涅来说是自由的象征，革命的象征。他希望能站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顶上，把法国的三色旗像降魔驱邪的神幡一样挥动，来驱走德意志大地上的幢幢鬼影，来唤醒他的人民，掀起革命的风暴。

为人民的解放而战的战士，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的发展，再认真研究历史

5 发展的规律，就必然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海涅积极地参加到革命者的行列中去，人们很愿意强调海涅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海涅比马克思足足大二十岁的这一事实。1843年冬，他们两人初次见面时，海涅已是一个名闻遐迩的著名诗人，世界观早已定型，而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写出他的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俩之间的密切交往和亲密友谊，肯定对他们双方都有益处。然而在这之前，海涅已经写出了一系列《时代的诗》，以实际行动参加到准备1848年革命的行动中去。是他自己经过革命实践、战斗经历和理论探讨，成为一个革命战士、革命诗人。海涅在他逝世前一年，1855年，写的《卢苔齐亚》法文版的前言里，谈到他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促使他产生这种信念的有两个因素：第一是逻辑，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必胜是符合逻辑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论你赞成还是反对，未来就属于共产主义。其次，是仇恨，因为他所仇恨的敌人也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因此他希望共产主义这个巨人能把这些虫子踩得稀烂。

谈到《卢苔齐亚》法文版的前言，人们又往往过多地指责海涅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海涅的确在那里写道：“想到这些愚昧无知的偶像破坏者即将掌权的时代，我心里就只有憎恶和恐惧。他们将用长满老茧的手毫不怜惜地砸碎我心爱的大理石雕像，他们将摧毁诗人所钟爱的一切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和供人玩乐的艺术品，他们将砍掉我的桂树丛林，在那里栽种土豆，那些不会纺织不会劳动，穿戴得像所罗门国王那样华美的百合花，他们也将被人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他们愿意拿起梭子来纺线。玫瑰花，这夜莺的无所事事的新娘，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而夜莺，这些无用的歌手，将被赶走。唉，我的《诗歌集》将被杂货商叠成纸袋，给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草。”倘若我们研究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冒牌的共产主义者，用自己过激的言论和过火的行动，在败坏着共产主义的名声啊。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有人用平均主义的货色来冒充共产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谈到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⑧。谁碰到这样的共产主义都会不寒而栗。难怪海涅当时会产生那样的恐惧。我们不该责备海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坚定，而应该惊叹海涅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他在当时就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必胜。然而实现共产主义将会遇到许多挫折，其中包括蛊惑人心的骗子用似是而非的极左言词来破坏共产主义的信誉。我们今天要赞扬海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信共产主义必胜，而且把马克思引为知己。

鲁迅一生在寻求振兴中华的途径，从他介绍摩罗诗派起，经过迷惘、徬徨，上下求索，

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及其失败，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他也从自己的革命实践、战斗经历和理论探讨，变成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战士。三十年代，反动派凶焰万丈，汉奸卖国贼鼓噪声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大有鲸吞中国之势，国际上法西斯主义杀气腾腾，凶相毕露，共产党内左倾路线使得革命元气大伤。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鲁迅坚信中国革命必胜。战斗十分艰苦，然而斗志从未懈怠。为了表示他对敌人始终怀着刻骨仇恨，他声称：绝不效法基督徒，在临终时也绝不宽恕仇人。无独有偶，海涅也留下了《遗嘱》一诗，表示他至死也不和敌人和解。

如今我的寿数已尽，
我也立下一份遗嘱，
留下遗言效法基督徒，
向我的敌人分赠礼物。

我的这些尊贵的对头，
道德坚定，应该承继
我全部的疾病和厄运，
以及我的全部残废。

我把阵阵腹痛遗赠你们，
他们活像钳子夹着肠胃，
还有刁钻的普鲁士痔疮，
和小便困难都赠给诸位。

你们应该得到我的痉挛，
手脚抽筋和流涎不止，
脊背上的骨头枯焦干硬，
全是上帝美好的恩赐。

遗嘱的附录是：
应该祈祷上帝
让你们的记忆变成遗忘，
让它消除你们的记忆力。^④

6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鲁迅在晚年终于对海涅有了全面的深刻的认识，知道海涅不仅是爱情诗人，还是革命诗人。1932年鲁迅翻译了德国《红旗》报上纪念海涅逝世七十五周年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柏林大学追随纳粹党的大学生，在广场上焚烧了进步作家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海涅等人的作品。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便和宋庆龄等进步人士亲自到上海德国领事馆去对这一纳粹暴行进行严正的抗议。在鲁迅为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写的译后记里，他对海涅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尽管在德国进步文学受到严重迫害——戈培尔和希特勒只不过强化了这种压迫——海涅还是得到了永生，并且更加光芒四射。相反，当时那些御用作家却连名字也没留下就被人忘记了。

一切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作家，都将名垂青史，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注：①《自白》，参看民主德国《海涅十卷集》，建
筑出版社1962年版，第7卷第153页。

②③④⑤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参看《鲁
迅全集》第1卷第58—59、59、57、57、67、67、67、
68、70、71、71、72、73、73、78、100—101、58、73、
101页。

⑥华尔德·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作家，以
其历史小说著称于世。

⑦罗伯特·骚色（鲁迅译作苏惹）（1774—1843），
英国诗人。

⑧拜伦诗体小说《海盗》中的主人公。

⑨拜伦诗剧《曼弗列特》中的主人公。

⑩“凯因”，又译作“该隐”，《圣经》中的人物，拜

伦诗剧《该隐》中的主人公。

⑪《天与地·一出神异剧》，拜伦的作品。

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的主要作品之一。

⑬弗里德里希·赫伯尔（1813—1863），德国诗人、剧
作家。

⑭⑮⑯参看《海涅选集》（文艺理论卷）第12、12、
113—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⑰岸阳子：《鲁迅与海涅》，参看日文版《海涅研究》
第6卷第54页，铃木谦三主编，东京信出版社，昭和60
年。

⑱参看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⑲参看《海涅选集》（诗歌卷）第345页，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5年版。